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传播的行动者网络研究

——以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为例

蔡瑞珍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 陈荣捷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 结合布迪厄场域资本概念探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翻译传播的行动者网络。陈荣捷凭借其在哲学场域内较为丰厚的社会文化资本, 联合发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项目的翻译, 并在项目进行中成功招募到出版社、基金、编辑人员、学界专家等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 完成翻译生产的网络。译本出版后, 出版机构的运作、专家学者以及网络读者的评论构成译本传播的行动者网络, 各网络之间相对自主, 但在行动进程上层层递进、交互联结, 共同促进中国哲学典籍在海外的传播。

[关键词] 陈荣捷; 中国哲学典籍; 翻译传播; 行动者网络理论; 社会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3-0067-08

一、引言

陈荣捷在海外弘扬中国哲学半个多世纪, 翻译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道德经》(The Way of Lao Tzu; Tao te ching)、《传习录》(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六祖坛经》(The Platform Scripture: The Basic Classic of Zen Buddhism)、《近思录》(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 and Lü Tsu-Ch'ien)、《北溪字义》(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 以及《宋明理学家诗》(Neo-Confucian Philosophical Poems)。《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以下简称《选编》) 是陈荣捷的成名作, 共 856 页, 1963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篇从中国古代的孔孟直至现代的冯友兰、熊十力, 涵盖儒、道、佛等中国哲学思想, 全面系统, 很具代表性。该书“自 1963 年出版以来, 一直是欧美广大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思想史’等相关课程必备教科书, 被欧美学术界誉为

介绍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完备、周详的珍本, 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界人士案头必备之书”^[1]。目前, 对于此书的研究集中于出版初期国外哲学界学者的评论, 国内研究主要将其融入到陈荣捷整个哲学思想研究中, 单独对其进行的翻译研究比较鲜见。本研究以拉图尔 (Bruno Latour) 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 以下简称 ANT) 作为主要理论模型, 结合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资本”概念, 尝试探究《选编》翻译传播的行动者网络, 为中国哲学典籍外译传播提供思考与借鉴。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 迈克尔·卡龙 (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约翰·劳 (John Law) 开始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便逐步发展起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逻辑是, 社会是在各种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网络系统, 行动者以其行动不停地协调并重新协调相互关系、定义并重新定义身份, 从而塑造并重新塑造社会^{[2]89}。“行动

[收稿日期] 2023-05-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学路径下陈荣捷中国哲学译介传播研究”(20XY002)

[作者简介] 蔡瑞珍 (1973—), 女, 福建尤溪人, 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翻译学研究。

者”既可以是人类行动者,也可以是非人类行动者,判断某主体,人类或非人类,是否是“行动者”要看他(它)们是否改变了情势的发展或改变了其他主体的行动,以及相关变化是否可测可查^{[3]71-72}。

布泽林(Buzelin)首先将ANT引入翻译研究,此后,翻译学者们开始将ANT应用于翻译生产传播过程研究;波尔(Boll)探究了“企鹅丛书”对西班牙语拉美诗歌的翻译出版;汪宝荣探讨了《红高粱》翻译网络构建和译本生产过程以及中国文学在西方传播的网络构建^[4-7];骆雯雁描述了《猴》译本的生产过程^[2],等等。本研究中,翻译传播行动者网络包括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和译作传播行动者网络,前者包括与翻译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项目发起、与项目运行有关的译者、基金、出版社、编辑、图书馆、协助者等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后者指与译作传播相关的出版机构运作、专家学者书评以及网络读者评论。不同行动者按照各自的逻辑运行,相对自主,但在行动进程上层层递进、交互联结,共同构成翻译传播网络。

三、《选编》翻译生产的行动者网络

(一) 项目发起

项目发起关涉原作遴选,王洪涛教授认为“原作的遴选既要从源语文学场域角度出发优先遴选其作者在中国文学场域中拥有更多文化与象征资本或其本身已被‘祝圣’的作品,又要从译语文学场域角度出发优先遴选西方英语国家文学场域需要或感兴趣的中国古典文论作品,二者之间的相互参照和结合更为理性”^{[8]41}。《选编》项目发起结合了二者场域需求。

1. 西方哲学场域的学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存在认知偏见,他们需要更加全面完整地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20世纪40年代初,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与陈荣捷在夏威夷大学开展东西文化交流工作,他们深切感受到西方学者对东方哲学思想理解的偏见,陈荣捷认为“西人对于东方思想限于上古时期,可谓毫无进展,且每视东方思想为消极。当时知识分子倾慕西方,谓

西方之月亮亦比东方之月亮为光明。于是益增西方消极之观点。摩尔与予乃决定翻译东方思想全部,使读者可以观全”^{[1]1}。虽然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从19世纪理雅各翻译儒学经典作品就已经开始,但是他们对东方思想的了解仅限于古代哲学典籍,缺乏对先秦之后哲学的认知与了解。“兴起于12—16世纪的宋明理学本身是古代儒学的产物,但经过与道教、佛教的不断修正融合,它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要全面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了解中国宋明理学思想”^{[9]ix}。基于此,陈荣捷决定把先秦之后的宋明理学思想介绍给西方学者,以改变他们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知局限。

2. 发起人在哲学场域内享有丰厚的社会文化资本,了解源语场域中已经被“祝圣”的中国哲学典籍作品。该项目由查尔斯·摩尔和陈荣捷共同发起,查尔斯·摩尔为耶鲁大学教授,是世界知名比较哲学专家,与陈荣捷等人共同创办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担任第一届系主任,共同筹办第一届东西方哲学会议,随后东西方哲学会议定期举办,对于促进东西方哲学思想文化交流具有开创之功。陈荣捷从小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熟悉中国哲学思想,是彼时唯一的专职中国哲学教授,被誉为“北美大陆的儒学拓荒者”,是20世纪50年代唯一为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哲学的人,也是英文出版物数量最多的中国学者^{[10]18}。陈荣捷在学术场域中结识交往了摩尔、狄百瑞等众多著名研究学者,与之构建起亦师亦友的“合作者”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成为陈荣捷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带来收益增值的效应。1941年,摩尔和陈荣捷联合编写《佛教哲学精要》(*The Essentials of Buddhist of Philosophy*);1944年,陈荣捷撰写的文章《中国哲学故事》(*The 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和《东方哲学精神》(*The Spirit of Oriental Philosophy*)被收录到摩尔编写的《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著作中。他们联合发起《选编》项目的翻译亦是其合作“惯习”的延续,陈荣捷在该书的致谢中特别提到,“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兼前同事查尔斯·摩尔,该项目是我们共同发起的,他为此书撰写了前言,没有摩尔绝不可能编写出版此书”^{[9]xiv}。二人的合作经

历亦是该项目发起的资本之一。

(二) 翻译过程

项目发起之后得到“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哈森基金会(The Hazen Foundation)等4项基金支持,在此之前的1948—1949年之间,陈荣捷曾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编写了一本新儒学选集,其中有一部分资料被收录到狄百瑞等人主编的《中国传统诸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该选集成为《选编》的一部分。此外,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及达姆斯学院也为编译此书提供了经费支持。这些基金会和学术团体是该项目的非人类行动者,他们构成了翻译生产的网络。

在各项基金资助下,陈荣捷作为翻译行动者网络的主体,开始了十余年漫长的编译之旅。因为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人员也被招募到该行动者翻译网络中,如哈佛大学元庆图书馆及其图书馆员裘开明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图书馆员霍华德·林顿先生、达姆斯学院贝克图书馆以及文献部门的工作人员等。贝克图书馆国际部日本图书馆员内奥米福田小姐,则帮助他查找日本资料、协助微缩拍摄^{[9]xiii}。鉴于陈荣捷在欧美哲学场域中享有的社会文化资本,他顺利得到业内知名学者的帮助与支持。比如,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埃德温·伯特(Edwin A. Burtt)、杜克大学教授阿尔班·韦杰瑞(Alban G. Widgery)都给予大力支持;陈荣

捷同事亚瑟·杜温(Arthur Dewing)教授为其指导有关英语用法问题;普林斯顿大学陈嘉善教授在梵文词汇方面给与指导;加州大学赵元任、耶鲁大学李天一、哈佛大学洪业以及杨联升教授在中文词汇和表达方面也给予指导和帮助。此外,韦茅斯(W. Weymouth)夫人Alice也帮忙打印手稿^{[9]xiv}。这些人类行动者为陈荣捷翻译扫除了文献、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碍,促进了《选编》翻译的顺利进行。

(三) 译本出版

出版《选编》之前,陈荣捷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过论著,获得这些出版社的信任与认可,积累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资本,合作者摩尔作为中西比较哲学教授,已经在美英学术场域和哲学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加之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哲学思想研究著名学者狄百瑞教授的推荐,顺利招募到大学出版社和相关编辑人员,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同意陈荣捷之前翻译出版过的《中国传统诸源》《传习录》中的部分内容经过修订后,收录到《选编》中^{[9]xiii};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及其主编兼编辑赫伯特·贝利(Herbert S. Bailey)先生为其提供出版基金,大力支助此书出版;出版社的詹姆斯·霍莉·汉福德(James Holly Hanford)女士对本书结构安排和修辞表达方面给予诸多建议^{[9]xiv}。出版机构和相关编辑人员构成的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保证了《选编》的顺利出版。《选编》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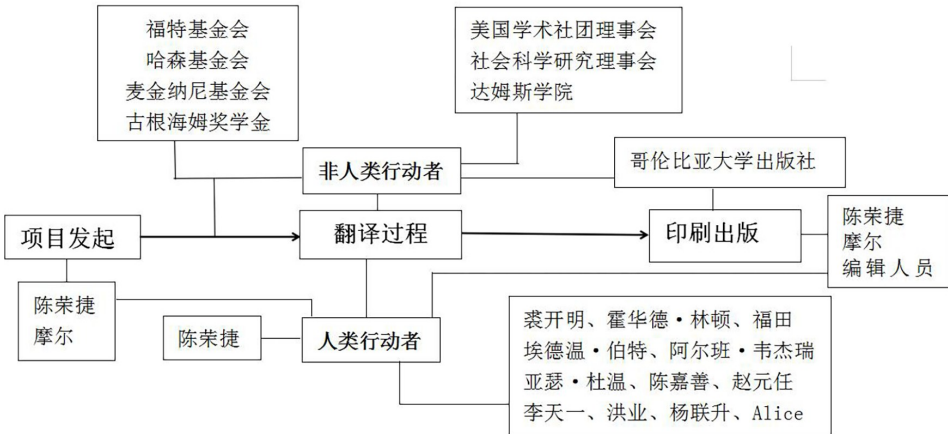


图1 《选编》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

四、《选编》传播的行动者网络

为了宣传推销书籍,出版社往往会开展书展、签名活动,邀请编辑或专家学者撰写书评。同时,译本的销售情况以及读者评论反映了译本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出版社的力推与专家读者评论构成译本传播不可或缺的行动者网络。

(一) 出版社的力推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05年,是美国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非营利性大学出版社之一,出版发行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专业书籍,在专业学术对话与大众读者领域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出版界享有雄厚的社会文化资本。出版社大力推荐《选编》,凭借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威望,招募到知名刊物编辑和专家学者对此书进行评论。比如,《周六评论》的编辑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认为,“陈先生的人文主义,是中国哲学每一个时代都不可避免的主题,《选编》是一部宏大而精彩的选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的编辑葛瑞汉(A. C. Graham)认为,该书“宋明理学部分的翻译尤为可靠,显示了译者对经典典故、早期语录体和宋明理学思想的熟悉程度,任何西方译者都无法效仿”;《哥伦布探询报》编辑约翰·库姆斯(John Coombes)认为,“陈荣捷渊博的学识使他的选篇能够在现代、中世纪与古代,儒教、道教与佛教之间取得平衡,他是著名的中国学者,第一次仔细权衡了中国哲学家的影响力、重要性及其关涉的哲学主题”;《圣经与宗教杂志》认为“这卷书确实是一部百科全书”,其封底写到“此书为真正理解中国哲学思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这些评论构成了推介传播此书行动者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二) 专家读者的评论

作为“精英读者”的专家书评,因其在场域内享有的地位和声誉,能够通过书评引导潜在的受众,影响其购买与阅读决策。书评人越多,

影响力和声望越高,越能推动图书的传播^{[11]40}。《选编》出版一年之内,书评大约有三四十条,被誉为奇书^{[1]2}。刘殿爵(D. C. Lau)、葛瑞汉、鲁惟一(Michael Loewe)、薛光前(Sih Paul K. T.)等知名学者对此书进行了评论。

薛光前认为,《选编》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涉历史更长,从古代一直到现代的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等中国哲学思想家,在完整系统介绍中国哲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valuable contribution)。一些重要的中国哲学选篇首次被译成英文,成为彼时中国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同时,他对于此书的某些译法、选编和印刷等方面提出异议^{[12]462-463};李庭植(Lee Chong Sik.)认为,“该书是第一部涵盖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选集,有附注、评述、章节引言,对于读者理解中国哲学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挥了重要导引作用^{[13]178}。

葛瑞汉对《选编》的目的、各哲学流派篇幅所占比重以及选编的依据作了阐述,他认为该书是“中国哲学始创至今第一部英文全集,有助于西方学者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篇目选择并非按照西方学者的兴趣,而是根据该选篇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影响来确定。同时,葛瑞汉对陈荣捷在语言使用、时间年代、术语翻译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14]63}。正是在这一点上,陈荣捷进行了详细地反驳,他认为葛瑞汉对于时间年代的阐述和哲学术语的翻译存在争议,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15]409}。其实,陈荣捷非常重视哲学术语的翻译,虽然“理”在《选编》的“中国哲学术语翻译”中没有体现,但是在《近思录》译本的“哲学术语表”中对“理”进行详细解释,并给出8条脚注,读者可以仔细对照研读,理解“理”的中西哲学义涵^{[16]367}。也许是受到葛瑞汉的质疑,陈荣捷在《近思录》译本的“哲学术语”中,用了很大篇幅对“无极”的翻译进行解释和修订^{[16]369-370},这也可以看作是陈荣捷对葛瑞汉关于术语翻译的一个回应。

① 这些编辑评论参考亚马逊官网对该书的评论: https://www.amazon.com/-/zh/dp/0691019649/ref=sr_1_1?_mk_zh_CN=%E4%BA%9A%E9%A9%AC%E9%80%8A%E7%BD%91%E7%AB%99&keywords=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qid=1644202411&sr=8-1。

鲁惟一认为,“此书涵盖了中国哲学思想最早的文献直至20世纪的中国哲学典籍作品,陈荣捷的成就非凡,有意了解中国哲学的一般读者和学生必须阅读此书”。但他也批评“此书有些术语没有定义清楚,可能会误导非专业读者,比如,用‘王充的自然主义’作为章节的标题,其合理与否,值得怀疑”^{[17]58-59}。陈荣捷明确指出,他的篇目选择主要考虑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非根据西方读者的兴趣进行^{[9]ix},因而,尽管《道德经》在西方已有40多个英译本,但他还是将其作为篇目之一。《选编》涉及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只能突出哲学家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并以此作为标题,比如,以“自然主义”凸显王充的哲学思想,但并不否认该哲学家在其他方面的影响。鲁惟一从西方学者“以西释中”的角度进行评论,认为“需要采用欧洲哲学家的表述”,而陈荣捷编译此书的目的旨在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哲学义涵,沿用其一贯“以中释中”的研究路径,尽量采用中国哲学思维表述模式,创造与西方学者不同的哲学话语体系。二者之间由于视角和思维模式差异,自然产生迥异的观点和看法。

刘殿爵介绍《选编》出版的意义、选篇比重、结构布局,并以较大篇幅指出此书的不足。他认为此书优点明显,富有价值(substantial anthology),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学生来讲尤为必要,可以充分利用^{[18]631}。但他对此书在导言、评述和译文准确性等方面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示例说明,并提供自己的译文。比如,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陈荣捷翻译成:Confucius said, “In hearing litigations, I am as good as anyone. What is necessary is to enable people not to have litigations at all”。刘殿爵认为,“该译文‘犹’‘必也’两个词语理解翻译错误,应该翻译成:In hearing a case I am no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If some difference must be found, it is perhaps that I get them not to go to litigation in the first instance”^{[18]633}。“必也”是《论语》中的常见词语,“必”表示“一定”“必然”“必定”,“也”表停顿,“犹”表示“如同”“好像”,陈荣捷对“犹”的翻译确实不太

准确,但对于“必也”的翻译,笔者认为其语义与刘殿爵的译文并无差异,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刘陈二者的争论本质上是由于二者在翻译目的、翻译思想以及目标读者定位方面的差异而引起的。陈荣捷翻译的目的是放眼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从中国哲学史全局观角度撰写评论和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并进行全面考察、参考各种注疏,形成了“学案式”的哲学研究译本,系统性、全面性和哲学性是其译本的主要特征;而刘殿爵的目标读者为普通大众,他无需在注释中追本溯源,更多考虑读者的阅读接受能力、接受心理、阅读习惯,虽然他的翻译也参考了各种注疏,但没有在译本中过多呈现其解释或理据,而是留给读者更广的思考空间^{[19]96-99}。专家读者的评论以及译者与读者的争论吸引了更多学者对《选编》的关注,促进译本在学界的进一步传播。

(三) 网络读者的评论

读者的评论不仅包括专家学者的书评,还包括普通读者大众的阅读感受与评价,而普通读者的评价更能体现对译作的接受与传播。汪宝荣教授认为,“读者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行动者,读者凭借其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进入传播网络中,通过实体书店、网上书店、图书馆或互联网完成购买或阅读行为,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或推荐吸引更多的购买者和读者。从作为专业读者的书评人的评论和大众读者提供的买家评价(customer reviews)中也能找到一些可靠的依据”^{[7]5}。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络平台,其读者评价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书的销售和接受情况。

笔者于2021年8月11日以“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为关键词搜索亚马逊官网,显示有3种版本:kindle版、精装版、平装版,共有评论68条,其中五星评价占77%,四星评价占16%,三星及以下评价占7%,说明好评率较高,达90%以上。收集到读者评论34条,年份从1998年至2020年不等,大都来自美国审核确认购买,还包含英国4条、德国1条,认为这些评论有帮助的共计137条。统计结果见表1、表2。

表 1 亚马逊网站《选编》译本读者年评论数统计表

评价	1998	2000	2006	2007	2009	2010	201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共计
评论/条	1	3	1	1	1	2	1	3	4	2	7	3	1	2	2	34
有帮助/条	53	54	4	/	5	3	/	/	6	/	8	1	2	1	/	137

表 2 读者评论情况统计表

评论维度	数量/条	比例/%
译本价值	26	76.5
使用对象	10	29.4
译本特色	11	32.4
拓展价值	6	17.6
负面评论	7	20.6

从表 1 可以看出，自 1998 年以来，虽然评论数量不多，但几乎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读者购买《选编》并加以评论，说明译本持续受到读者的关注。表 2 是 34 条读者评论的统计情况，“译本价值”指译本在学界中的地位与作用；“使用对象”指译本适合哪些读者群；“译本特色”包括译本内容框架、翻译质量等；“拓展价值”指读者阅读译本之后所做的其他相关阅读或参考；“负面评论”指译本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关的意见和建议。不同的评论维度有交叉，即同一条评论中可能涵盖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既涉及“译本价值”，又涉及“使用对象”或“译本特色”。统计表明读者对译本价值的好评占 76.5%，与前面五星评价占 77% 基本对应，说明大多数读者肯定译本的重要价值。对“译本特色”和“使用对象”的评论比例分别为 32.4% 和 29.4%，说明读者对这 2 项维度比较关注。对译本“拓展价值”和“负面评论”分别为 17.6% 和 20.6%，说明译本有一定的读后效应，但也存在不足。

进一步研究发现，读者对译本价值的评论使用“excellent book, irreplaceable book, no competitors, perfect, great overview, absolutely essential, enduring tome, treasure house, a must, amazing book”等高度赞扬的词汇。比如，署名 Mori Ikari 的读者认为“西方人了解亚洲的道路

复杂而艰难，《选编》是该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milestone），是对哲学事业的重大贡献。对“译本特色”的评论主要认为陈荣捷的引言（introduction）、评述（comments）、注释（annotation）、词汇表（grossary）对于阅读很有启发和帮助。比如，署名为 Daleach 的读者表示“喜欢该书（really love this book），语言容易理解（easy to understand）”；来自英国的 Amazon Customer 表示“该书对于学习中国哲学的学生来说必不可少（absolutely essential），我喜欢陈荣捷的语言风格”。

对“使用对象”的评论，一般说明此书可以作为教材使用或建议使用对象。署名为 cvairag 的读者认为“对于那些学习中国哲学、宗教、社会的学生而言，该书是不可忽视（can hardly be ignored）的学术宝库（treasure house）”；哲学初学者 Thomas Adam Hill 称赞道，“一个好朋友借给我这本书的时候，东方思想的精华就像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绽放。陈荣捷是一个真正的圣人，我极力推荐这本见解深刻的学术著作（a rare insightful and scholarly work）”。不少读者表示在看此书的同时与葛瑞汉、韦利的《道德经》译本进行比较，参考加德纳的《学做圣人》（*Learning to Be a Sage*）以及陈荣捷与狄百瑞合编的《中国传统诸源》等儒学材料，显示了该译本的读后效应。

对译本的负面评价覆盖面较广，涉及篇目选择、翻译质量、装帧质量、编者观点等方面。比如，署名 Gary Arbuckle 的读者对陈荣捷关于公孙龙和董仲舒的选篇真实性（authenticity）提出质疑；署名 Kindle Customer 的读者认为“陈荣捷翻译的英文有些地方缺乏连贯（lapses into incoherence），他喜欢使用西方哲学术语，但他的评述（comments）让人感到困惑（confusing），如，他将程朱学派描述为‘理性主义’（rational-

istic)，而将陆王学派描述为‘动态唯心主义’（dynamic idealism），既不准确也无助于理解”。

研究发现，与陈荣捷相识或用过此书的读者评论，既有正面的，也有批判性的，这类评论往往得到更多读者的呼应。比如，署名为 Marilyn H. Dorato 的评论得到了 24 位读者的呼应，认为他的评论有用。该读者表示陈荣捷是他大学时候的哲学教授，他使用该书情况与众不同。他认为虽然陈荣捷乐于接受不同的观点，但还是比较保守，此书写得非常简单（simply written），初学者容易掌握，并把它推荐给那些对该学科有兴趣的人阅读，但他也质疑该书的内容，认为“任何一本书都不应该没有质疑的内容，正如任何教师都不应该被视为最终的权威”。

Gary Arbuckle 的评论获得 53 位读者的呼应，他在教学中使用此书，并表示感谢，但他认为此书也有一些“陷阱”，读者/学生应该知道。（1）陈旧。该书 1963 年出版，作者已经去世，所以不会再修订。文本选择非常“传统”，哲学定义狭窄，公孙龙和董仲舒的选篇存在真伪问题。（2）保守。轻易相信早期不确定的年代时间，关于老子的讨论也存在问题。对某些时期的哲学思想有所轻视。（3）偏见。对于新儒家的观点大都认为正确，削弱了对更早时期儒家思想文献的讨论。但 Gary Arbuckle 也认为“这些都不是不使用这本书的理由”。

出版社的运作、专家读者的评论、网络读者评论构成《选编》传播的 3 个行动者网络，他们按照各自的逻辑运作，相对自主，但在行动进程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交互联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享有较高的社会文化资本，其力推促进了《选编》的营销畅通，使之获得初步的社会认可，同时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或刊物主编对其进行评论，推动了更多专家学者对此书的关注和评论，累积更多专家读者群，获得学术认可。网络读者的积极或批判评价，扩大了该书传播的读者群体，拓展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五、结 语

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尝试探讨陈荣捷中国哲学典籍《选编》翻译传播的行动者网

络。陈荣捷凭借其在场域内较为丰厚的社会文化资本，联合发起《选编》项目的翻译，并在项目进行成功招募到出版社、基金、编辑人员、学界专家等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完成翻译出版的网络。译本出版后，出版机构的力推、专家学者以及网络读者的评论构成译本传播的行动者网络，对三者进行考察，反映了中国哲学典籍《选编》在海外的传播状况。

〔参考文献〕

- [1] 陈荣捷.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M]. 杨儒宾, 吴有能, 朱荣贵, 等, 译, 黄俊杰, 校阅.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2] 骆雯雁.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生产描述研究中的应用: 以亚瑟·韦利英《西游记》为例 [J]. 外语研究, 2020 (2): 84-89.
- [3]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 BUZELIN, H. Unexpected allies: How Latour's network theory could complement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5 (2): 193-218.
- [5] BOLL T. Penguin book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Spanish and Latin American poetry 1956-1979 [J].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2016 (25): 28-57.
- [6] 汪宝荣. 葛浩文英译《红高粱》生产过程社会学分析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12): 20-30.
- [7] 汪宝荣. 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传播的社会学分析模式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4): 1-8.
- [8] 王洪涛. 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理论思考: 社会翻译学的观察、主张与方略 [J]. 中国翻译, 2021 (6): 38-45.
- [9] CHAN, WING-TSIT.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10] 崔玉军. 陈荣捷与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1] 汪宝荣.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模式: 以西方商业出版社为中心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2): 34-43.
- [12] SIH, PAUL K T. "Book-review"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4, 23 (3): 462-463.

- [13] LEE CHONG SIK. "Book-review"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Current History*, 1964, 4 (277): 178.
- [14] GRAHAM, A. C. "Book-review"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4, 84 (1): 60–61.
- [15] CHAN, WING-TSIT. Rejoinder to A. C. Graham's review of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4, 84 (4): 409.
- [16] CHAN, WING-TSIT.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 and Lü Tsu-Ch'ie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7] LOEWE MICHAEL. "Book-review"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965, 97 (1): 58–59.
- [18] LAU D. C. "Book-review"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6, 29 (3): 631–634.
- [19] 杨言, 胡翠娥. 陈荣捷与刘殿爵的《老子》英译本之争 [J]. *国际汉学*, 2020 (3): 94–101.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from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by Wing-tist Chan

CAI Ruiz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China)

Abstract: Wing-tist Chan'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promotes the spread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English world.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Bourdieu's concept of field and capit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by Wing-tist Chan. With relatively abundant socia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hilosophical field, Wing-tist Chan jointly initiates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book and successfully recruits the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cluding publishing houses, foundations, editors and academic experts to construct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network. After the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the operation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review of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the comments of online readers constitute the three actor-network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lassics. Each network is relatively autonomous, but progressive in the process of action, and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hich promo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verseas.

Key words: Wing-tist Chan;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ctor-network Theory; sociocultural capital

(责任编辑 陈蒙腰)